

● 二十一世纪高校文科教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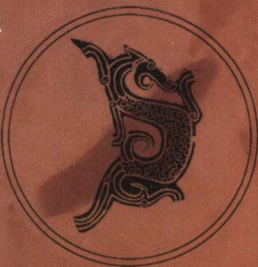
章学发凡

郑颐寿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高校文科教材



辞章学发凡



郑颐寿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章学发凡/郑颐寿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40-812-6

I. 辞… II. 郑… III. 汉语—修辞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7101 号

辞章学发凡

作者: 郑颐寿

责任编辑: 何 强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87536724

印刷: 福州市计委印刷厂 邮编: 350005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490 千字

印张: 26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812-6/I·537

定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本书摘要

本书对汉语辞章学的定义、性质、对象、体系、规律、研究的方法、目的、任务及其发展的前景作了描述，为辞章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做出了努力；尤其重视领会“顶尖级”大师的代表性巨著中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进行阐释。

本书用“四元六维结构”理论作统帅，具有较大的创新，解决了辞章学研究中一系列带原则性、宏观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本书既继承汉语辞章论的优良传统，发掘其精华，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做到古为今用；又借鉴西方的先进理论，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使之中国化，做到洋为中用。

本书是理论著作，是对作者二三十年来辞章教学的总结和三四百万字辞章艺术编著的升华，以促进辞章学的群众化、社会化。

本书虽是辞章学论著，却融入修辞学、文章学、语体学、文体学、风格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规律与方法，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可作为这些学科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也有促进、推动作用。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

——马克思

我们能够逐渐建立起来自己的汉语
词章学……^①

——吕叔湘

建立和汉语语法相对待的学科——
汉语词章学。

从语文教学上说,则要采取辞章学的
路子,按辞章学的系统组织教材,组织教
法,从而达到培养提高听说读写的实际运
用语言的能力的目的。

——张志公

^①早期“词章学”与“辞章学”并用,现在都用“辞章学”。

汉语辞章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张 静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郑颐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汉语辞章学教授，他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以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为完整、系统的汉语辞章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赢得了学界的盛誉。

郑先生这部以“四元六维结构”为核心的构建辞章学理论框架的力作，见解独到，立意新颖，读后深受其益。可以说，它为我国汉语辞章学树起了第一座里程碑。谨作此序，以表我对此书的肯定及对郑先生由衷的敬佩。

语言，从一产生就是一种极不驯服、不可理喻，但又不能信马由缰、不能无规无矩的音义矛盾统一体。它像幽灵一样回荡在人类社会之中，刺激着、折磨着人们的意志，沟通着、推动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因而长期以来，被人们赋予了模糊、古怪而神圣的光环。语言在这种光环中至少存在了一二百万年。为了揭掉罩在语言头上的微妙灵幻、不可捉摸的面纱，人们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语言的揭秘活动。我国从周秦、两汉到20世纪初叶，有过许多关于语言（包括辞章）的丰富、精辟的论述，都从某个侧面记录了生活的真实，传承了文化的内涵，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桑。但是，由于研究的对象、步骤和方法的局限性，未能使这种论述成为具有科学品位的系统独立的语言学科，只是作为文献学、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零零碎碎地研究一些仅仅同语言及其辞章有关的问题。直到20世纪初，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的德·索绪尔才清楚地指出了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并归结出人类语言的一般法则和基本模式，从而使语言成为可理解可驾驭的东西，使语言的研究获得了真正的科学品位。渐渐地，人们从对于语言的古老崇拜中，从对于语言的现实追求中，发现了语言不仅使人类文明更加灿烂辉煌，而且由于它本身的穷新极变、叠彩纷呈，无可置疑地成了人们沟通、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工具，在信息化时代成了最重要、最直接的信息载体，因而对语言学科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我国的语言

研究在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语言学也曾被誉为领先科学。

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说，近些年来，语言学许多部门的研究为了追求“高精尖”的理论体系，一头钻进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运用的牛角尖。人们普遍感到这些理论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既难教又难学，而且学了之后对于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没有多大裨益。在人们争分夺秒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语言除了少许应用学科还有点市场之外，很多学科，如“语言学”、“语法学”、“语音学”等，已经门庭冷落，远远地脱离了群众，几乎无人问津了！如果率由旧章，语言的理论知识不能指导语文的运用实践，不能致力于提高人们的听说读写能力，如果不能把这个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信息化，语言学这座大厦将面临倒塌的威胁，或者再次被“边缘化”。

有幸的是，有远见卓识的语言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日趋严峻的现实，自20世纪60年代末，吕叔湘、张志公等先生就大声疾呼，极力倡导创建能够提高人们驾驭语言能力的汉语辞章学。受吕、张等语言学家的启迪，“十年动乱”之后，一批热心于语言综合运用的研究者，从修辞学、风格学、语法学等学科的土壤里培育出辞章学的新花。他们以辛勤的笔耕，为汉语辞章学的建立运砖加瓦、添光增彩，做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贡献。郑颐寿先生就是其中的领军学者。他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卓尔不群的风采，为汉语辞章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也为汉语语言学这座大厦树起了一根粗壮坚实的顶梁之柱。

顾名思义：“辞章”是指词、语、句（包括字、音）的选择、运用和理解，句群、段落、篇章的设计、安排和欣赏以及语体、文体风格的形成和鉴赏，“学”就是指导辞章运作的理论学说。如果这些内容能成立，辞章学就是多方位、多角度的“语言综合运用”之学，或者说它是在“收购”、“兼并”了修辞学、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的实用成分之后重组新建的“集团公司”。它是语言学科一个较大的分支，是修辞学、语法学等学科的上位概念，而修辞学、语法学等都是它的下位概念，至多可以说是它的既从属又“单独核算”的“二级机构”。辞章学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能提高人们驾驭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也将会为大势所趋的国家信息化提供坚实的载体基础。我们可以断言，汉语辞章学的建立和发展，还可以使我国的语言学科重放光芒、再现辉煌。

前车为鉴，在辞章学的初建阶段，是不是应该走“普及——提高——再普及——再提高”的康健之路？一个学科，只有普及，才能深入人心，才能有群众基础，才能创造提高的条件，使学科更具生命力，令人信服地步入品位较高的科学殿堂。为了普及辞章学知识，扩大辞章学的影响，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在深入细致地研究辞章学各个领域诸多问题的同时，还要编写一些精练简明、深入浅出的、能够进入各级学校课堂的教学用书以

及社会各界人士能够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自学用书。

我作为一个语言学阵营退役的老兵，衷心祝愿汉语辞章学根深叶茂、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2005年4月30日于郑州

（张静：著名语言学家、教授，原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

开拓汉语修辞学的新视野

王德春

郑颐寿教授来信嘱我为他的《辞章学发凡》写一篇序。我因去湖北讲学，没有及时收到信。回沪后我接到他的催稿电话，当即放下手里的工作，欣然命笔。

颐寿是我在修辞学领域的多年好友，他一贯热心于修辞学会的工作。早在25年前中国修辞学会成立之初，他就帮助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林承璋先生为总会的《修辞学论文集》和华东分会的《修辞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做过不少具体工作。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他发行十几万册的处女作《比较修辞》、首部汉语《辞章学概论》和主编的《文艺修辞学》等，都对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02年，他托黎运汉教授转给中国修辞学会一份申请筹办辞章学研究会的报告。我们感到以颐寿为核心的一支研究队伍有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和可行的研究计划，经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成立。同年12月，我与运汉以及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程祥徽教授等去福建，在泉州召开的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上，我代表中国修辞学会宣布辞章学研究会成立，颐寿任首任会长。研究会成立后，他们就有组织地开展研究。不久前，我收到颐寿寄来他主编的《辞章学论文集》（上、下册，约70万字）、《大学辞章学》（约47万字）、《辞章学辞典》（约100万字）和他的专著《辞章学导论》、《辞章学新论》（两书近100万字），翻读之余，甚为欣慰，从中看到了辞章学研究会的研究实力和发展前途。

颐寿现把他一百多万字的《辞章学论稿》分为三卷：第一卷《辞章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第二卷《辞章学起例》，第三卷《辞章学流别》。每卷各自独立，又可互相补充，组成一个系列。《发凡》一书即将付梓，希望这篇序也能及时付印。

初步浏览《发凡》全书，我感到，这是一部“大修辞学”或称“广义修辞学”的力作。我一贯主张修辞学要突破以辞格为中心的框架，研究以语境为基础，以言语规律为重点的现代修辞学，不仅研究语言体系的修辞手

段和方法,更要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和话语等方面的修辞现象。这与颐寿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作为“广义修辞学”的“辞章学”的“广”、“大”,首先表现在“在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表达↔承载↔理解的双向互动”(见《辞章学概论》44页,1986)。在此基础上,颐寿把它升华成“四元六维结构”(以下简称“四六结构”)理论。以此为纲,他主编了《文艺修辞学》(1993)、《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1993)、《辞章学辞典》(2000)等,共两百多万字,并且发表了《论辞章学》(1994)、《先秦修辞理论与“四元六维结构”》(1999)、《“四六结构”与修辞三论》(2000)等论文,“四六结构”的理论渐趋成熟。如今,他用这个结构来统率《发凡》全书,阐释辞章学诸多宏观、中观、微观的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受到海内外专家的好评。其次,辞章学之“广”、“大”,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科学的语体观,概括辞章之三大功能:审美功能、致用功能、审美与致用交融的功能。

从言语规律概括辞章现象:常格、变格、畸格,也就是“零点上下”的现象。

从语言运用的实际需要出发,认为辞章学应研究语音、文字、词语、句子、句群、章篇、辞格、表达方式、艺术方法、语体、文体、风格等。诸多内容在辞章学体系之中,显得繁而不杂,井然有序。

从辞章具有融合性的特点出发,从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吸取营养:除了语言学之外,还吸收哲学、美学、文学、信息理论以及艺术理论的营养。

《发凡》以“四六结构”为纲,系统阐释了辞章学的理论体系:对象、定义、性质、效果、规律以及研究的任务、目的、方法、步骤和发展前景。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以“诚美律”作为指导辞章活动的总原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年代,强调“诚美律”,不仅有学术价值,并且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发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在辞章学的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颐寿利用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的机会,又与台湾学者合作,主编《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三百多万字),加强两岸交流,扩大研究成果。承蒙信任,邀我为该套丛书的顾问,给我和中国修辞学会一次支持分会工作的机会。不仅我们中国修辞学会支持他,而且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先生也支持他们的辞章学研究工作。我祝愿《丛书》和《发凡》的成功。希望《发凡》的姐妹书《辞章学起例》、《辞章学流别》两卷书也早日与读者见面。

是为序。

2005年5月9日于上海

(王德春:著名语言学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中国修辞学会会长)

辞章学理论研究的系统创新之作

宗廷虎

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发表 70 年后的今天，我有机会先读到郑颐寿“广义修辞学”——《辞章学发凡》的书稿，非常高兴。应作者之邀，愿为之作序。

我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文理兼顾，古今沟通，东西融会，对汉语辞章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它的理论框架、理论体系，尤其是对带原则性、宏观性的理论作了全方位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知、新解。我对它进行初步归纳，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作了全新的开拓或补充。

一、论析了“顶尖级”大师貌似“对立”实则一致的学术观点，为学科的建设扫清了思想障碍。吕叔湘、张志公倡议要建立汉语辞（词）章学，而陈望道认为“词（辞）章学就是修辞学”，“词（辞）章学这一名称可以不用”。表面看，他们的观点是对立的。郑颐寿不是简单地支持甲方观点，反对乙方说法，而是用辩证的观点，不仅看现象，而且看本质，不仅充分肯定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功绩，而且深入阐释随着时代而发展的新成果。郑颐寿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60 年代初这 30 年的发展历程，从陈望道对其《修辞学发凡》发表 30 年后的修辞学对象论的“大大拓展”了的事实，看到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两度飞跃，其“30 年后”所讲的“修辞学”，可称为“广义修辞学”。从这个意义讲，“词（辞）章学就是修辞学”的观点可以成立。郑颐寿的新说，又解决了陈望道与吕叔湘、张志公貌似对立实则一致的学术观点（请阅本书《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两度飞跃》）。这种实事求是、认真探赜索微，而不是简单地褒此抑彼，或者无原则地“和稀泥”的做法和精神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二、从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高度，借鉴古今中外相邻、相关学科，寻求一个最根本的理论框架，用来阐释辞章学之诸多宏观以至中观、微观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四元六维结构”（简称“四六结构”）理论。这个结构的雏形，已见于郑著的《辞章学概论》（该书 44~45 页），其后逐步发展、完善。它借鉴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创作论、信息论、批评论、古今文论、语言学，甚至音乐、绘画、舞蹈的相关理论，融入、发展了“再现文学”、

“表现文学”、“表现理论”、“模仿理论”、“社会批评模式”、“接受批评模式”、“本体批评模式”等等中西古今的相关理论,它与美国康奈尔大学阿布拉姆斯教授以作品为中心的四要素三维三角的批评结构图示相比,有很大的发展,也比史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四要素四维圆形的文论结构图示更为完善。至于被钱钟书、胡奇光等专家所肯定的“语义三角形”理论等仅成为“四六结构”的一个部件了。福建省第四届社科评奖组专家在评价其获奖书《言语修辞》时指出“四六结构”理论比上述“四要素三维三角的批评结构”、“四要素四维圆形的文论结构”的图示更周全,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郑颐寿用“四六结构”统率辞章学之诸多根本理论,对相关学科的理论也有很大的补充和创新。诸如,用“四六结构”阐释——

辞章定位论。给辞章定位在“话语艺术形式”上,以区别于内容与形式并重又只研究书语的文章学,也区别于以“语言为本位”要求表达“好”的修辞学。但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其目的在于“有效、高效地表达、承载并借以适切、深入地理解话语信息”。

辞章定义论。在张志公否定了“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或“文章之学的一个侧面”之后,郑颐寿感到自己于1986年给“辞章”所下的定义还比较确切,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解决了张志公交给“后来者”的一道难题。

辞章性质层次论。指出代码性、融合性、一体性是最具个性的特性,扩大点是桥梁性、示范性、交际性,再扩点是时代性、民族性、实用性,这就把学科的统一性和特殊性都兼顾起来。

“广义修辞”即辞章说。不仅谈辞章外沿之面广,又兼及“致用”与“审美”,要求既“通”又“对”且“好”而“妙”;不单谈“表达”或“接受”,而且兼及“表达”、“承载”和“理解”以及“表达”、“理解”可互易其位;不仅谈静态之辞章现象,还论及其生成与理解的动态过程;既谈表达之“有效”、理解之“适切”,又论表达之“高效”、理解之“深入”。这才是真正“广义”之“修辞学”;辞章学。

“三辞三成说”。给几千年来“意成辞”、“意先辞后”作了限定,对于“辞不能成意”、“辞先意后”作了全新的解说,指出了双向之“意成辞”、“辞成意”和“辞意相成”之辩证法。

“体、意先后说”。千余年来,都谈“文章以体制为先”,“体为先”几乎成为定论,而郑颐寿认为从鉴赏讲,“一观位体”才是“体为先”,“体”属于“辞”;从表达讲,应是“意为先”,以“意”驾驭“体”。

“辞章信息论”。给信息论之“编码、承载、传递、解码”的链条,增加了两极“信源之源”、“信宿之宿”,使辞章学更富哲学性和辩证法。

“辞章表达(生成)论”。总结了四个阶段说,为修辞名家的“一个阶段论”、“两个阶段论”、“三个阶段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开拓。

“辞章鉴识(解读)论”。大大扩展了传统的“知人”、“论世”说,为“审

美”、“致用”的观点提供理论依据。

“辞章双向互动论”。把言语交际理论引进辞章学领域。

“辞章作用、效果论”。以辩证法观点为“表达效果”、“交际效果”作了极为重要的引申,提出“潜在效果”、“自在效果”、“他在效果”、“实在效果”的新理论。

“四元世界”论。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百家的相关理论作了科学的梳理、归类,以揭示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辞章学的理论。

“常格论”、“变格论”。寻找言语内部规律,论析了不同语格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文本世界的动态的形成原因,解决了新的言语体系的建设问题。

“表心律”、“适境律”。对修辞学“第一要义”的“适应题旨情境说”作了新的阐释和延伸。

“得律论”。提出“语体、文体功能对应论”,给传统的文体论注入新的血液,解决“语体”、“文体”或则概念相混、或则两相分离的问题,把中西理论衔接起来。

“诚美律”。这是对两三千年来辞章学宝库遗产的深挖所熔铸出的金块,解决了辞章运用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和最高原则,熔社会学、伦理学、美学、言语学的重大理论于一炉,以充分发挥辞章的社会功能,为辞章学的社会化、群众化解决了重大的理论问题。

三、科学方法的运用。科学方法是对科学理论的实施,是通往新境界的桥和船。郑颐寿研究辞章学,最根本的是用辩证法来指导具体方法的运用。下面谈两点。

一是正反对照、动静相形。郑颐寿从辞章(含修辞)活动的过程,对动态辞章(含修辞)现象进行剖析,这就是用同一作品的原稿(或初版)与修改稿(或修订版)作比较。此法被鲁迅先生誉为“极有益处的学习法”。它不同于传统修辞学“见反不见正”或“见正不见反”的静态研究方法。郑颐寿还用“四六结构”对这种活动作理论的升华,从中总结出在客观世界基础上的“表达 $\rightleftharpoons$ 承载 $\rightleftharpoons$ 理解”三位一体、写读互易其位的话语规律,并由此提出建设建构辞章学、文本辞章学、鉴识辞章学和表达修辞学、文本修辞学、理解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辞章学的构想;从中总结出常格、变格、畸格的言语规律以及此三格组合成的九组语格变化模式,提出建设常格辞章学、常格修辞学,变格辞章学、变格修辞学,规范辞章学、规范修辞学和汉语语格学的构想。这些构想,本书已用一些章节作了初步的阐述例析。

二是数学原理的运用。这是使研究科学化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本书及其相关论著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几点。

(一)用坐标原理分析文艺修辞、科普修辞、科技修辞之思维、信息、语格特征,这在其《文艺修辞学·导论》中已经运用。作者还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以口语、书语、电语这三种传递媒介为纬,以艺术体、实用

体及其交融体为经,建构语体坐标,再由此发展成语体平面。它解决了语体划分上的难题,使语体类别划分更加科学化。国内外不少语体学家在对语体作划分时,都是先从传递媒介(口语、书语)作第一层次划分,继而从功能(文艺、政论、法律等)类别作第二层次划分,这就因划分标准不能一以贯之,造成了逻辑上的不严密,使诸多语体现象无法放在一个平面上。郑颐寿语体平面的建构就解决了这一国内外研究中的难题,使语体与实际运用紧密地挂起钩来,为建设“计算机辅助阅读、写作数据库”开辟了一条新路。

(二)提出“体素”(语体要素)与“体素值”的概念,还由“格素”(风格要素)提出“格素值”以及这类“值”的大、小、正、负和变值、增值、贬值的动态变化理论,为语体规范、风格规范提供了有效的办法,用以论析“得体”与“失体”、风格的优劣,为建立“风格优化学”作理论依据,使语体、风格这种语言运用中形成的“总的特征”、“气氛格调”的理论不仅可以“意会”,而且可以“言传”,化繁为简,便于学习和运用。这些理论得到同行专家首肯并载入汉语风格学史书中。

此外,郑颐寿还用“四六结构”总结辞章体系论、文章修改性质性、章法论、表达方式论、艺法论、辞格论和语音、文字、符号、词语、句子论等宏观、中观、微观的理论,就不一一细述了。

我写了上面的话,作为“导读”吧。全书篇幅大,如果读者还无暇细读,不妨先看看它的《前言》的第二大段和《“四六结构”的运用述要》三节,就可得出正确的评价。它对辞章学的理论建设,对作为独立学科的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的理论建设,对实际的语言运用,都有所裨益。

一部书,能够如此高屋建瓴、全方位多系列地对学科重大理论提出新知、新解,总结出新理论、新规律、新方法,建构新体系,开拓新境界,指出发展的前景,我们不能不为此而高兴。是为序。

2002年10月

(宗廷虎:著名修辞学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原中国华东修辞学会会长、《修辞学习》主编)

辞章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林承璋

顾寿先生和我相识将近30年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处女作《比较修辞》初稿送审时的情景。稿中那工整娟秀的字迹,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以后接触多了,我深感到他善于思考、刻意创新,勤于实践、奋力笔耕。这些看法,本书稿就是最好的证明。它的出版,对于汉语辞章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建设,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对于提高语文教学和语言教学水平,都将做出突出的贡献。

我国辞章学(含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的理论遗产十分丰富,涉及学科的方方面面,但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1961年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倡导要建立汉语自己的辞章学。1986年顾寿先生推出我国第一部辞章学专著《辞章学概论》。1996年张志公出版《汉语辞章学论集》。如今顾寿先生又将推出《辞章学发凡》。我认为,这些图书的出版,是汉语辞章学发展史上几个阶段性的成果。其间,还出版顾寿先生有关辞章学的多部著作。值得强调的是,台湾博士生导师陈满铭教授及其高足张春荣、仇小屏、陈佳君诸年轻博士也推出了十多部共三四百万言专门性的辞章学(辞章章法学)专著,福建祝敏青教授则推出了《小说辞章学》。它们使汉语辞章学的研究蔚为大观。

这给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问题:科学的汉语辞章学这门新学科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认为,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以独具的特色,绰约的风姿,自立于百科之林。

当然,科学的普通汉语辞章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是以顾寿先生这部《辞章学发凡》为标志的。这是辞章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这门学科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但建立起这门新学科,谈何容易!这是顾寿先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勤奋钻研和理论创新的结果。顾寿先生善于“广益多师”,认真学习、领会古今中外相关学科理论,诸如哲学、美学、文学、文章学、信息学、心理学、语言学、言语学及其下位学科话语语言学、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等,从中吸取营养,融会进学科建设中;重视学习、深入领会修辞学家陈望道、张弓和其他近现代修辞学界前贤今秀的研究成果,

尤其重视深刻理解吕叔湘、张志公有关辞章学的重要论述,提出了自己对新学科建设的见解。其中最富特色的是“四六(四元六维)结构”理论。

综观全书,“四六结构”理论是站在辩证的哲学高度,对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特别对其中与辞章学联系密切的学科理论,进行梳理、扬弃,取其精华,建构汉语辞章学的理论体系。

“四六结构”理论的总结、发展,也是有个过程的。1986年出版的《辞章学概论》,顾寿先生建构了“四六结构”理论的雏形,提出了客观世界、表达、鉴识与话语等“四元”;并勾勒了“四元”之间的联系,共有六组,称为“六维”:表达与鉴识、话语与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与表达者、客观世界与鉴识者、表达者与话语、鉴识者与话语。在话语生成与解读中,他提出了在客观世界基础上“表达 $\Rightarrow$ 承载 $\Rightarrow$ 理解”三元双向互动的思想。他一贯重视采用原文与改文(或初版与修订版)作比较的例子。改文绝大部分是选自语文名篇,经过语文专家、修辞学家修改的。他认为,这些例子是阐释表达与理解互换,“表达 $\Rightarrow$ 承载 $\Rightarrow$ 理解”三位一体的最好例子。这比单从表达或单从理解一方来谈言语活动更全面。

1987年,顾寿先生和我联合主编的《新编修辞学》也有这个构想。修辞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修辞效果。该书把“表达效果”界定为“话语对接受者,对社会所产生的客观效应”,要“使接受者不仅理解,而且信服、感动,以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世界”。这实际上就是其“四元”理论的体现。至于他独著、主编的几部“修改艺术”著作,都是对“四六结构”理论的实施。

1993年顾寿先生主编《文艺修辞学》,明确提出用“四六结构”理论统帅全书,并在其执笔的《导论》中用了五万字的篇幅对“四六结构”理论进行阐述。接着,他又写了《先秦修辞理论与“四元六维结构”》、《言语风格与“四六结构”论》等系列论文,还用这一理论主编了《辞章学辞典》等论著。

《辞章学发凡》融入古今中外的相关理论,又把“四六结构”理论的研究推进一步,解决了辞章学及其相关学科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诸如辞章学最大的理论框架,辞章活动的最高原则“诚美律”和其他规律、方法,辞章学的定义、性质、体系,总结了“三辞三成说”、“结构组合结合论”、“辞章活动四个阶段说”、“四在效果说”等等。

根据“四六结构”理论,联系索绪尔的内外语言学理论,顾寿先生还提出了内辞章学、内修辞学、外辞章学、外修辞学,提出了建辞学、本辞学、解辞学及其诸多下位学科的建设、发展等一系列理论。

顾寿先生用“四六结构”理论阐释了话语作品修改活动的性质,提出了表达、鉴识的双向互动、位置互换等新的见解。这些对于语言教学、语文教学,对于编辑人员和广大文字工作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辞章学发凡》还重视划清辞章学与修辞学、文章学以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联系和区别。

总之,《辞章学发凡》学术性强,开拓性大。概括起来,它具有两大优点。

一是全书具有鲜明而突出的哲学思辨。“四元六维”理论,话语之“辞”与“意”,辞章总原则之“诚”与“美”,言语规律之“常”与“变”、“健”与“畸”,言语风格之优与劣,内蕴情志要素与外现形态要素,功能语体之艺术体与实用体及其交融体,言语媒体之口语与书语及其交融的电语,语体之纵坐标与横坐标,“格素”、“体素”之值的正与负、大与小……它们之间都充满着辩证法。

二是古今中外,广益多师,博大精深。由于辞章具有融合性,顾寿先生善于从语言学、言语学及其下位学科和相关学科,甚至从绘画、书法、音乐、舞蹈、建筑中总结出共通的原则,汲取其精华,既立足于现代、中国的基点上,又能从古代、国外的相关学科中借鉴其优秀的成果,建构了现代汉语辞章学的理论体系,营养了学科的机体,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全书既有突出的民族特点,浓厚的中国风、中华味,又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当然,一门新学科的建设,独木难支,好在北京、上海、台湾都有一批研究者,福建也一样。20世纪70年代后期,顾寿先生就把辞章学的观点用于现代文选、文章学、修辞学等高校教学中,培养了不少年轻的研究者。经过多年实践,出版了《辞章学概论》,他又用此书在几所高校试用,开设选修课,并向福建师大申请,成立了辞章学研究室,后又升格为辞章学研究所,招收了祖国大陆首届辞章学硕士生,辞章学研究的队伍逐步扩大了。2000年,福建师大申报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修辞学、辞章学,顾寿先生是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带头人之一上报的。此博士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顾寿先生又向中国修辞学会申请成立全国性的辞章学研究会,作为中国修辞学会的二级学会。2002年11月,中国修辞学会批准成立此一全国性的辞章学研究会,顾寿先生为会长。所有这些,对于组织研究队伍,培养学术梯队,加深、扩大修辞学的研究和辞章学这门新学科的建设,都将起到组织的保证作用。

近年来,顾寿先生又注意与台湾学者交流、合作,优势互补,这对于辞章学这门新学科的建设不仅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辞章学发凡》书稿写成,顾寿先生嘱我写序。我就谈以上几点,作为推介吧。我相信21世纪汉语辞章学将更加发展、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2年10月于福州

(林承璋:修辞学家,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